沉默者的声音

——美国苗族《苗绣之声》2001年夏刊述评

王 薇

(贵州师范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18)

摘要:《苗绣之声》是美国苗族英语文学发展过程中一本具有重要意义的杂志,其2001年夏刊中的很多作品为读者呈现了诸多沉默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作家们对沉默这一现象的关注与思考。以该刊中的若干作品为例,探讨作品中的沉默主题,分析沉默的原因、内涵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如何打破沉默,以期更好地解读美国苗族英语文学作品,并领悟作家们建构苗族女性与少数族裔话语权以及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愿景。

关键词: 美国苗族; 沉默; 话语权; 叙述声音

中图分类号: I10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798(2015)08-0011-04

DOI:10.13391/j.cnki.issn.1674-7798.2015.08.004

The Voice of the Silent

——An Analysis of the Summer Issue of Paj Ntaub Voice of 2001

WANG Wei

(Guizhou Normal College, Guiyang, Guizhou, 550018)

Abstract: Paj Ntaub Voi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Hmong American literature. In its summer issue of 2001, those Hmong American writers expressed their concern and thoughts about the silent phenomenon by presenting us a lot of silent characters. Through exploring the theme of silence, analyzing the reasons and connotation of the silence and how those characters break the silence, this paper intends to have a better interpretation of Hmong American literary work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writers' 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power of Hmong female and minorities and also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ulti-culture.

Key words: Hmong American; Silence; Discourse Power; Narrative Voice

一、社会历史背景

东南亚苗族自从1975年“秘密战争”后迁居海外以来,迄今为止已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生活了近四十年的时间。一直以来,他们都努力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英语作为美国苗族的官方和通用语言之一,在美国苗族的生活占有重要地位。随着英语在美国苗族生活中普及程度和重要性的不断提高,涌现出一大批使用英语进行文学

创作的苗族作家。萌芽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美国苗族英语文学,迄今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并逐渐从荒芜走向了繁荣。笔者曾对近三十年美国苗族英语文学作品进行过文学文献学的系统考察^[1],“将近三十年来美国苗族英语文学作品的历史作了断代划分,就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文学作品及其特点进行了总结,对我们深入了解海外苗族英语文学作品发展的历史轨迹具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2]7}

在美国苗族英语文学创作发展的早期,出现

收稿日期: 2015-07-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海外苗族英语文学研究”(项目批号: 13XW003); 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贵州师范学院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基地建设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薇(1981-),女,江苏扬州人,贵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 海外苗瑶族群英语文学。

过一本具有重要意义的杂志——《苗绣之声》(Paj Ntaub Voice)。“Paj Ntaub”,念作“pa - dao”,在苗语中意为“织绣”。据史料记载,苗族在其历史演进中曾一度拥有过书写系统,然而苗族的文字却在漫长的跋涉迁徙中遭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毁灭。于是,苗族妇女们想出了刺绣的办法,将苗族文字隐匿于布块上精心排列且错综复杂的花朵和几何图形中。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苗族文字最后却在美丽的图案和颜色中消失殆尽。尽管如此,苗族的刺绣图案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浓缩了苗族的历史。可见,《苗绣之声》的编者之所以用“Paj Ntaub”作为该刊物的名称,是想将本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所形成的民族历史集体文化记忆用文字文本的形式记录和保存下来。作为美国苗族文化与艺术领域创办时间最早的刊物,《苗绣之声》一年出版两期,每一期都会登载15至25位作家或艺术家的作品,涉及原创性文学、视觉艺术作品以及各种评论性文章等等。刊物的宗旨是鼓励和扶持海外苗族作家的文学创作,发现和培养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从而发展和壮大海外苗族文学的队伍。自1994年第一期出版至今,已有若干的美国苗族作家通过这个平台展现了自己的作品^[1]。

《苗绣之声》2001年夏刊聚焦美国苗族族群中的“沉默”这一主题。黑色的亮光纸封面上印着白色的“silence”(沉默)一词,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发人深省。在刊首语中,美国苗族著名女作家、刊物主编马玫能(Mai Neng Moua)回忆起自己童年时的经历:母亲经常告诫她不能提太多的问题,更不能在年长的苗族男人面前喜形于色或是手舞足蹈。因此,“沉默”对年幼的她来说不仅是一种习惯,还是一种传统。她总是会“将‘沉默’与‘弱势’‘惩罚’和‘权力’这类字眼联系在一起。‘怎样让一个长期以来噤若寒蝉的民族‘发声’?怎样让那些不习惯在公众面前表达自己的人用文字讲述自己的故事?怎样让人们将深藏于心的情感述说出来?在一个缺乏书面文学传统的民族里,怎样鼓励和扶持年轻的作家们书写自己不同的经历?”^{[3]4}这些疑问都是作者们在这一期的刊物中共同关注和思考的热点话题。

当代后殖民理论大师爱德华·萨义德在一篇题为《流亡的反思》的文章中指出“流亡令人不可思议地使你不得不想到它,但经历起来又是十分可怕的。它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虽然文学和历史包括流亡生活中的种种英雄的、浪漫的、光荣的甚至胜

利的故事,但这些充其量只是旨在克服与亲友隔离所导致的巨大悲伤的一些努力。流亡的成果将永远因为所留下的某种丧失而变得黯然失色。”^{[4]173}由此可见,流散者在流散的过程中虽然会有所收获,但这些与流散带来的巨大哀伤相比仍会显得黯然失色。美国苗族族群作为典型的流散群体,其辛酸的流散历史和苗族作家创作的特殊社会背景,使得他们在文学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呈现了诸多沉默者的形象。这些作品风格各异,叙事角度独特,内容涉及家庭生活、代际冲突、两性情感、异域生存困惑、性别和身份认同等多元化的社会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苗绣之声》2001年夏刊中的若干作品进行解读,以探讨美国苗族英语文学的沉默主题,分析沉默的原因、内涵以及作品中人物如何打破沉默,构建苗族女性和少数族裔话语权的生存图景。

二、话语与权力

话语与权力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都是学界热议的焦点之一。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话语与权力密不可分,话语受权力的控制、影响和支配,反过来又表现权力,具有行使权力的功能,并且是权力争夺的对象。福柯曾说“‘话语’是一种隐匿在人们意识之下的深层逻辑,暗中支配着各个不同群体的言语表达、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它是对某一特定的认知领域和认知活动的语言表述。”^{[5]133}因此,“话语并不是单纯的语言表述,它蕴含着复杂的心理机制和社会规则,进而反映了交谈者双方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意识形态、身份等抽象概念。”^{[6]128-129}与话语相对的沉默,是人们表达思想以及对世界认识的另一种方式或途径,而沉默者往往是话语权控制与支配的对象。

《苗绣之声》2001年夏刊中的很多作品表现了对沉默现象的关注。美国苗族作家陶努寇(Noukou Thao)在其短篇小说《花园》(The Garden)中展现了一种发生在代际之间的沉默现象。作品的主人公是一名年轻的美国苗族女孩,她生活在大都市芝加哥,大学毕业后选择在一家财务公司工作。自从被提升为区域财务经理一职之后,女孩就过上了令人艳羡的高级白领生活,“双膝上搁放着笔记本电脑,皮质柔软的蔻驰挎包内放着灵巧的手机,嘴唇上涂抹着裸色系的香奈儿唇膏”^{[3]14}。她居住在芝加哥的豪华公寓内,驾驶着雷克萨斯的高级轿车;她经济独立、优雅自信、前程似锦,仿佛“屹立在世界之巅”。相比之下,她的父母和兄弟则生活在威斯康辛州阿普尔顿的

农场,靠耕种土地或是在附近的工厂打工为生。因为在父母的五个孩子中排行居中,所以她不用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女孩知道自己虽然不是家族中第一个获得大学文凭的女性,但踏实勤奋的品格和强烈的进取精神却让她的资产在职业生涯的前三年便接近百万,这在整个家族中都是前所未有的。繁忙的工作使得她鲜少归家探望父母和家人,大相径庭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更让她和父母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明显,作品中的苗族女孩只能通过沉默与疏远来逃避这种隔阂。而她和父母之间的沉默,一方面源于代际间固有的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也是女儿所代表的美国文化和父母坚守的苗族文化相互碰撞的结果。女儿身上所体现的美国文化价值观表明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化,这和她父母所秉持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背道而驰。不和谐的价值取向导致两代人心理上难以逾越的鸿沟,也促成了他们无法沟通的痛苦。

苗族女性的沉默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长期以来,苗族社会都遵循着父系制度,在族群和家庭中处于配角与边缘地位的苗族女性,不断受到来自父权社会的贬抑和压制。她们被迫接受着“未嫁从父,既嫁从夫”的礼数,在失去身份的同时也被剥夺了话语权。苗族女性从小就接受着“男尊女卑”的男性意识,并且集体处在忍辱负重、逆来顺受的“失声”状态,成为了男性话语权控制与支配的对象,以及满足男性欲望的客体。王愫(Sue Vang)的诗歌《箱子里的女孩》(Girl in a Box)就塑造了这样一位苗族女性缄默者的形象,全诗如下:

她是一个被装在箱子里的女孩/她不知道自己是一份等待着/被开启的礼物/还是一个被人遗弃的囚徒/最终将在孤独中死去/她的一生/都在与沉默抗争/五岁时的一天放学后/她被一个白人男孩追赶/那个孩子谩骂她,朝她扔石子/她不明白为什么/母亲看见后会一言不发/因为不想摇晃她的箱子,她沉默了/……/十五岁时,她不知道为什么/她好朋友的父亲在亲吻她之后/却不准她告诉任何人/因为不想摇晃她的箱子,她顺从了/当她二十岁时,她不再问为什么/但她仍然疑惑、沉默/任由她的箱子在恐惧中漂浮。^{[3]20}

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指出“臣属妇女处在父权制传统文化和父权制帝国文化的夹缝中,失去了言说的权利。”^{[7]135}美国苗族女性正是这样一些长期被边缘化而遭受双重压迫的“他者”。在美国苗族文化语境中,身处“臣属”地位的本土民众通常被主流文化认定为“他者”。然而,美国苗族的“臣属”妇女这一弱势群体又因

承受本土父权文化的压迫而被打上了双重“他者”的烙印。美国苗族女性一方面作为美国苗族人,为美国白人主流文化贬低而失去价值;另一方面又因遭受着父权的压迫,失去发声的权利,被边缘化。诗中,白人主流文化和本土父权文化对女孩的双重压迫体现在两者对女孩的精神折磨和肉体蹂躏之上。女孩在五岁时就遭到白人男孩的歧视与欺凌,但是母亲的沉默不仅让她感到疑惑,也让她养成了沉默的“习惯”,以至于自己在十五岁遭到朋友父亲的凌辱时仍然选择沉默和顺从。苗族男性利用自己在权力等级中的优势地位为所欲为,将本族女性作为自己泄欲的对象,从而使得本族女性沦为在肉体和精神上长期保持缄默的“他者”。本族父权制霸权文化对妇女的抑制和禁锢,剥夺了她们的话语权,使得她们长期处于失声的“他者”地位。

此外,家庭生活和两性之间的沉默现象也在一些作品中得到了体现。李峰帕英(Pacyinz Ly-foung)在其短文《一个受虐待女人的辩护词》(A Battered Woman's Advocated Speaks)中描述了一位遭受家暴的苗族妇女形象。作为“亚洲受虐妇女组织”(Asian Battered Women's Organization)的一名成员,作者前往这个女人的家中给她提供安抚与救助。“这个女人看起来虽然疲惫但却很平静。我们简单地谈论了她的婚姻问题,并且回忆了她的丈夫被逮捕前的几天内发生的事情。让我惊讶的是,她居然能够如此平静而又漫不经心地讲述这一切在我看来非常骇人的事情。”^{[3]28}苗族女人对家暴一事的反应让作者感到诧异,然而这恰好说明了家暴对于她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的“家常便饭”。在她俩的谈话进行到一半时,女人的丈夫回到家中。他虽因实施家暴被警察局拘留了48小时,但却丝毫没有悔改,反倒继续对妻子进行胁迫。慌乱与无奈之下,作者只能驾车带着这个女人到警察局避难,并提出给她及其孩子提供住所与帮助,然而这个女人最终却选择了回到家中继续保持沉默。

苗族女性作为男权社会的边缘人,被剥夺了话语权而长期处于沉默的状态。然而,在女性完全丧失话语权的时代,被灌输了“父权”和“夫权”思想的女人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忍气吞声”或“沉默隐忍”而换来丈夫的善待和人们思想的转变。作家们通过笔下沉默的女性形象,表达了对苗族女性的深切关怀与同情。他们也逐渐意识到长期处于沉默和压抑生活中的女性正面临身心崩溃的边缘,女性要获得生存的勇气,寻求生存的意义,只能依靠自己,打破沉默,奋力争取自我言说的

权利。

三、性别与差异政治

福柯不仅认为话语是权力争夺的对象,权力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差异与不平等;他同时也指出,“反抗与权力是共生的,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8]240}西方女性叙事学开创人苏珊·兰瑟在研究特定时期女性取得话语权策略,以建构女性叙述声音理论时,也曾说过“对于那些一直被压抑而寂然无声的群体和个人来说(声音)这个术语已经成为身份和权力的代称。”^{[9]3}东南亚苗族女性在迁居美国等西方国家之后,虽然在家庭和社会地位上有了较显著的提升,但有关性别角色的传统观念在美国苗族族群中已然根深蒂固。因此,作为美国社会弱势群体的一部分,苗族女性也在边缘地位坚持不懈地寻找能“发出自己声音”的情感表达方式,通过不同的声音来表明各自的意图和立场。

短篇故事《花园》(The Garden)中的那位苗族女孩与父母间的沉默在一次周末归家时得到了改变。她看到了自己许久未见的侄子和侄女,被他们的天真和童趣所感染;与兄长的促膝谈心让她想到了自己和家人初来乍到美国时的艰辛与不易,想到了父母在躲避战乱时不堪回首的遭遇;最后,她陪伴着父母到自家的花园中采摘蔬菜,父母的悉心关怀重新打动了她。在返程的途中,她激动不已,决定打破长久以来与家人之间的寒冰与沉默,“回家”将成为她每年夏天例行的事情。从对家庭关系的被动接受到主动言说寻求改变的过程,女儿打破了自己与父母之间的沉默,化解了代际间长久以来的矛盾与误解。

诗歌《我姐姐的歌声》(My Sister's Song)中,苗族女性的境遇让人唏嘘不已,诗人的描写相信会让很多苗族女性读者感同身受,潸然泪下:

我姐姐的歌声温柔地划过黑夜/她的声音与其他姐妹们的声音交相辉映/她们都生活在昏暗的地牢之中/也许这个监狱是她身为女人,为了自己的罪行/应该遭受的惩罚/她必须嫁人/必须繁衍后代/她不能说不/她也不能言说/她只能说是/因为她所说的一切都会遭到反对/她们的声音被淹没得太深/她们都忘了怎样哭泣/她们的沉默激活了我姐姐的歌声/……/从未有一首歌让我感到如此强烈。^{[3]30}

显而易见,诗歌用十分痛切的语言揭示了“姐姐”以及“其他姐妹们”身为女人的遭遇,她们得为此付出代价、接受惩罚,不仅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还丧失言说的权利。暗无天日的悲苦生活

好像身在“地牢”一般。然而,“姐姐”却通过唱歌这种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将无人理解、无处倾诉的困境传递出来。不仅如此,“姐姐”的歌声也唤醒并激励了“其他姐妹们”加入到吟唱之中,她们集体发泄自己的苦闷和质疑之前所遵循的传统道德标准,合力向父权价值体系发起挑战。诗人赋予叙述主体觉醒的女性意识,唱歌成为了身处边缘的“他者”的反抗策略,她们重新夺回了话语权,用唱歌这样非常规的言说方式,解构了沉默的既定形象,建构了苗族女性的话语权。

值得注意的是,刊物中虽然对沉默的女性形象着墨较多,但也有作家呼吁打破苗族族群的集体沉默,建构苗族族群整体的话语权。如张蜂(Bee Cha)在其散文中写道“在这样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美国),不能满足于仅仅做一名苗人。我们必须超越自身。我们必须与众不同。我们需要做出改变。顽固盲从不能修正我们的思想;冷漠淡然不能终止我们的遭遇;沉默无声也不能减轻我们的痛苦。而我,也不会在一味地回顾中获得满足。”^{[3]11}可见,这些作品不仅可以使读者了解到苗族女性和苗族族群的整体生存困境,还可体会到作家们的创作意图,即通过话语权的逆转和建构,表现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作家们想要改变性别和种族身份对立,构建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愿景。

参考文献:

- [1]王薇.近三十年来美国苗族英语文学创作的文学文献学考察[J].民族论坛,2014(8):14-17.
- [2]纳日碧力戈.全球学术对话背景下的海外苗瑶学术文献资源研究[J].民族论坛,2014(8):5-7.
- [3]Mai Neng Moua,Eds. Paj Ntaub Voice [J],2011(2):8-30.
- [4]Edward Said.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173.
- [5]万涛.论华裔美国文学的沉默主题[J].江西社会科学,2010(7):133-136.
- [6]刘晓燕.沉默·言说·颠覆白人的主流话语霸权[J].湖北社会科学,2014(6):128-132.
- [7]祁亚平.双重“他者”的压迫与颠覆——《舞动卢纳萨节》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J].当代外国文学,2012(3):134-142.
- [8]米歇尔·福柯.福柯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240.
- [9]苏珊·S·蓝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

[责任编辑:周冬梅]